

● 刘增杰 主编 ●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东北流亡文学史论

● 沈卫威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东北流亡文学研究论



●刘增杰主编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东北流亡文学史论

● 北卫威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主编 刘增杰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金 刘思谦

刘增杰 关爱和 杨吉哲 武国华

解志熙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东北流亡文学史论

沈卫威 著

责任编辑 杨吉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76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15-02015-0/I·205 定价(精)6.80元(平)4.80元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前言

本丛书是由河南大学中文系近、现代文学研究室编辑的一套专题研究丛书。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然而，许多研究领域，仍期待着新的开拓。这套丛书，我们既着眼于纵向延伸，打破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界限；又向往于研究工作的横向拓展，对某些尚待深入探讨的课题，作了一些初步的专题研究。我们深知自己才疏智拙，力难胜任。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孜孜不息地求索，向读者献上自己诚实的思考。

这套丛书，以收录青年研究者的著作为主，兼收部分年长学者和中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它大体上反映了我们这个现代文学研究群体的实际面貌。许多年来，作为一个研究群体，我们倾心吐胆，朝夕切磋。这些专著，虽主要来自执笔者的个人努力，但也渗透着师友的情谊和心血。一些由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扩充而成的著作，更是国内有关专家精心教诲的结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也是一种纪念，一段温馨的记忆。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多方关怀和支持。对他们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我们表示由衷的感激。

丛书分两辑出版，第一辑初步选定六种。

1991年10月

题 记

在那历史上灾难沉重的十四年里，版图变色，民族危急，为了救亡图存，东北作家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了流亡者和战斗者。身在异乡，心情惨淡，为了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诉说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为一些已泯没的、被掩盖、不能支配的自由而讲话，他们选择了文学艺术，并依靠文艺的美和文艺的自由，赢得了他们人生的价值。

概观这批作家，民族的特殊命运，尤其是他们被迫离开故土的流亡生涯，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的感情冲动成倍地增加。他们强烈地体会了当时的悲哀、苦闷等社会问题。哀伤本是人们同现实和解的一种情绪，苦闷则是他们生活不下去的一种压抑的痛楚。然而，在东北流亡作家个人成长的因素中，“和人心的其他任何气质比起来，忧伤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要深刻得多”。^①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是和他们流亡的不幸连在一起的。他们有着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内心深处饱经（个人的）痛苦、（民族的）忧患而获得的极为珍贵的那种自己的东西。情感在胸中堆积、酝酿所造成的沉重负荷，随着个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激化以至升华，使他们感到有说话的必要，创作心态趋向于一吐为快的审美选择，并由此决定了文学的性质。因此，他们自觉而近乎本能地将个人的感情和痛苦提高为民族、社会的东西，由郁郁不平到挺身而出，慷慨悲歌，把他们“全部

^①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思想贯注在自己的民族上，把爱国主义、希望、对背叛祖国和伤天害理的行径的憎恨以及对正义最后必胜的信心提炼压缩在作品中，并以一种真正独一无二的方式，把这些情感投射到一个共同的焦点上”。① 爱与憎的旋律，浓重的伤感和乡恋、悲壮和伤心惨目的情节、场景，受难者和反抗者的群象，鲜明、独特的地域色彩，苍凉、悲壮、沉郁、粗犷的总体风格……总之，理性的笔触，很难测得它形象世界应有的底蕴。

——摘自笔者《烽烟铁蹄下的流亡文学》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第25页，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导 言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为诺贝尔奖得主伊·普里戈金的《从混沌到有序》(与伊·斯唐热合著)英文版做序时,说了这样一段关于科学研究观念变迁的话——他认为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在文学研究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实际上“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诸如常见的那些作家论、作品论的写法——“创作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影响与局限”的板块组合。这样一来,复杂的问题常被简单化,整体的观念常被割裂了。

本书的写作便是试图寻找一种整体的文学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观照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东北流亡文学的结构形态和特质。

“流亡文学”的概念——

“流亡文学”这一概念是从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中借来的。勃兰兑斯在论述19世纪法国文学时,发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法国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在随后的两大暴政期间,一批法国文人作为现行政府的反动派,被迫逃出国土才有可能从事他们的创作活动。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独立思考的法国人才能存在,

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①。其特点就是反抗的倾向。勃兰兑斯认为“如果要给这时期的文学活动一个总的名称，恐怕没有什么比‘流亡文学’更合适的了”^②。经过对这一群流亡作家的成长和发展的讨论之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互相交织的整体。无数线索把他们相互联系在一起，从一部作品伸向另一部作品……这一些作品、这一批作家只是形成一个集团，而不是形成一个流派。一些有共同倾向的头脑和作品自然地无意地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集团；一些自愿接受某些大体上得到明确地系统阐述的信念作指导的作家，有意地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流派”。^③同时，作者还将“流亡文学”溯源到卢梭，指出是他的作品启发和指向了一个更进步的文学时代，使“流亡文学”可以说成了19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随后，勃兰兑斯又写了《波兰印象记一十九世纪的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再次使用“流亡文学”的术语，认为十九世纪的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有三种文学形态：被放逐者的文学、流亡者的文学以及留居本国的人的文学。并且较为明确地指出波兰流亡作家们“作为流亡者或浪迹天涯的人，他们不得不寄人篱下，做不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没有定居，没有家。他们被人从故土连根拔起，这影响到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变得不稳定。”^④因此，用文学来探求民族的生存，成了他们“天赋的使命”。因为在他们的笔下，民族观念浸染一切。这种民族观念实质上是包裹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为民族而斗争被看作一种宗教性质的义务而予以接受，并以“灿烂辉煌，炫人眼目”的文学形式，呼唤着民族、祖国的解放。从而创造出“使别国人感到惊奇，为之倾倒”的浪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第199页。

④ 《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第22页。

漫主义文学。

本书大胆地移植了“流亡文学”的概念，并作为全书的立论依据和结构的纲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流亡文学”，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所决定的。那便是三、四十年代，大中华金甌有缺，在东北存在着一个由日本侵略者卵翼、扶植下的“满洲国”。而这个“国家”的性质，名为清王朝的复辟，实为异族——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政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移植而临时扶植起来，并维持十四年的“国家”，而不愿做这个“国家”的臣民的一批东北文化人被迫逃进山海关，流亡关内，并自由地写作，产生了一大批文学作品，我便借勃兰兑斯的文学术语，称之为“东北流亡文学”。这种“文学”只是相对于“满洲国”而独立存在的文学形态，并与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科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寻找一些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可以使个别的自然过程归因于一般的规则，且从一般的规则推演出来”。^①本书以一种整体的文学观念和认知途径，在已有的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基础上，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观照视角，并运用现代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对十四年东北流亡文学进行宏观的把握。当然，任何意义的宏观都必然有具体、坚实的微观作基础。但本书的立足点不是微观意义上的作家论和作品论的编年史，而是在于寻求宏观意义的规律，并从中推演出一些一般的规则来，即在混沌中探寻有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森林形态”的勾勒，而非具体的“树木结构”的剖析，藉以克服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

当然，要描述、分析、评价这样一种文学形态，可以有多种

① 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153页，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多样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件不易的工作。丹尼尔·霍夫曼提醒我们说：“批评家或文学史家，面对着个人的、有特性的作品和作者，有可能把这些作品或作者归为一般的类别和趋势；他甚至可能不惜牺牲其他所有的作品和作者，着重强调那些他写作时看得见的趋势”。^①这似乎是一个可以觉察到，但又不易避免的事。

认知途径——

“在所有的文学中，我喜欢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尼采的这句话使我与之认同，并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心理基础。

历史上的白山黑水曾养育过无数勇敢勤劳的人民，却不曾养育出自己的杰出作家、诗人。本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后那个外敌入侵、民族蒙难的岁月，白山黑水之间，铁蹄刀枪之下，萧军、萧红、李辉英、舒群、罗烽、白朗、马加、端木蕻良、骆宾基……一批年轻的东北作家随着国土的沦丧而流亡关内，闯入文坛。他们怀着深广的悲怆和忧愤，捧出自己那颗燃烧的心，以庄重而合度的节奏与时代同步——写版图的变色、乡邦的灾难和人民的抗争，用爱和憎的旋律奏出了东北作家独特的音调，为现代文学的交响乐章增添了几个清新、亢进的音符，并赢得了“东北作家”的殊誉，也为自己的创作争得了冠以“东北”这一故土、家园的标记，至今在中国文学这一历史的长廊里，烙有“东北”的独特印记，并使东北人引以为自豪的是“东北流亡文学”这一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沉重的历史感，并能在共时的比较中不示弱于其它地域文学的文学。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和十四年对这块殖民地的统治，无疑是东北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灾难，然而这场灾难的重要机制的一个相反系统变量却是大大加

^① 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序》第3页，王逢振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速了东北人的觉醒和殖民地化的进程。因为这段历史破坏了东北固有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北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人文心理结构。这时某种强力开始起作用，它在痉挛、阵疼中收缩了时间，在侵略者野蛮的兽性对东北的封建文明的人性的破坏中，重新建立了新的殖民地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殖民地文学。而这里所说的“东北流亡文学”是指受东北的历史文化孕育，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阵疼的催动下降生的一代文学青年流亡关内后，以东北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相对于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殖民地文学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是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既融汇在“左翼文学”、“抗战文艺”、“延安文艺”之中，又因内在的文学精神而相对独立成形。

作为时代风云与情绪的历史，往日它曾给人们带来了需求，今天则要求我们对它进行审视和思考，但“目的不在于把它再现出来，而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黑格尔语）。就其结构形态和价值体系来说，东北流亡文学已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尤其是文学的历史。作为历史，它本身一向被认为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因为它是已经过去了的事件，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总是这个样子，是一个既成的事实。然而，它又是一个活的实体，是一个主体的灵性可激活的实在的对象。对于研究主体来说，东北流亡文学作为文化科学，它没有严格意义的统一性和系统的结构，它不可能象自然科学的某一元素那样，完全被纳入一个体系之中，并与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使之在既定、先验的模式中就范。任何方法，只能提供一个透视的视角和感知的途径。对于研究者来说，观念和方法不是唯一的，但又是必需的。因为没有所谓的观念和方法，就不能有所谓的探索标准，“不可能对我们的猜想

的批判，也不可能对无知的探索以及对知识的追求”^①。任何方法论都对作为文学的历史的东北流亡文学起着编史理论和元历史理论的作用。因为任何文学史的撰写都要受某种方法论的支配，每一种方法论都为写史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而倾斜并依附在某一框架之上，这本身决定于客观与主体的取向，即所谓的“理论的偏向”乃至“偏见”。因为“没有某些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②同时，还应清楚地认识到，无论选择哪种方法论作为审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尺度，都无法将其全部文学的事实容纳到其中的理论框架中，任何一个理论都只能说明一部分事实，另有一部分事实它无法按照自己的方法原则加以规范。

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是作为研究者主体——我与“东北流亡文学”这样一个客体发生“关系”后的产物，不论是谁与之发生关系，谁就会经验他心目中的感知、意象，更多的是观念，我的概括、归纳、演绎都是建立在我与之发生关系后的感知，尤其是观念基础之上，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主体随意性和模糊性，而已不是也不可能纯客观的东西了，即烙有我的感知、体验、理念的印迹，渗入了我主体的色彩。作为一个以极大的热情，以个体身心介入其中并为之发生关系的主体，我以自己的心灵之光去观照东北流亡文学，那么，它将在我的心灵之光的烛照下发生相对的属于我的倾斜。我将变被动的求知认同为主动的积极参与，在东北流亡文学这一流动的链条上紧紧地扣上几环，以积极的创造和属于我的重新阐释，构建其新的结构形态和价值体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面对着东北流亡文学这已作为历史事实的客体，任何主体与之发生关系，就会见智见仁，但究竟达到本

①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43页，傅季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20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体的什么程度，这似乎不是我要回答的。我的阐释，只是我与之发生关系后产生的新“质”。因此，这里就面临着“价值”与“评价”的问题。本世纪初“历史哲学理论”的追随者，弗赖堡学派著名代表人物H·李凯尔特主张将“价值”和“评价”区别开来。这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史，乃至所有历史的人来说，在进入“历史”和走出“历史”的认识运动的走向上及由此带来的思维开放、自我张力的自由这一层意义上，无疑是有启发的。事实上，我们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是要确立某一文学事实是否有价值，而只是在叙述、阐释实际上发生过、存在着的事情，挖掘其中的内涵，是那已发生了的文学史的局外人——理论工作者。而“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①但是，价值是与现实联系着的。“首先，价值能够附着于对象之上，并由此使对象变为财富；其次，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②。为了确立东北流亡文学作为文学遗产——精神财富是否配得上“精神财富”的称号，就需要对价值所依附的对象，即作为符号存在的作品进行处理，将它与共时的现实和影响后来的历时的现实作出审视，即有效的考察——评价。也就是说只有当价值实际上被主体所评价，价值所依附的对象——作品实际上被看作是文学遗产——精神财富的时候，我们才对价值加以考察，即对实际的东西加以确定。但是确定本身并不意味着对这个对象彻底的定性、定质，只是对其中部分价值，即与主体联系进行认识。因为“评价始终必须或者是肯定，或者是否定的”，也就是“赞扬或责难”。然而，“无论赞扬或责难都与价值没有联系”^③。因为价值本身早已依附于对象（作

① 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78页，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 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78页。

③ 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80页。

品的形式，即文字符号）而存在，不论你赞扬或责难，它都先于评价而独立于评价主体意识之外，使对象变成精神财富，评价只是价值与评论者主体活动所发生的关系，即实际上的价值联系（存在）与理论上的价值联系（认识）。

这里区分“价值”与“评价”的目的，意在进一步说明本书对东北流亡文学的观照、阐释，即某种意义的评价与东北流亡文学的价值本身的关系，只是相对的。这里衡度的价值，只是与研究主体发生关系的那部分，而非绝对价值。这既是我作为研究者的自我认识，也是学术研究中应有的宽容的态度。

目 录

题记	(1)
导言	(1)
上篇 发生发展论	(1)
引子：“白蚁启示”	(1)
第一节 孕育（1931年之前）	(2)
第二节 降生（1931—1935年）	(9)
第三节 崛起（1936—1937年）	(15)
第四节 抖落（1938—1940年）	(28)
第五节 分流〔上〕（1938—1945年）	(42)
第六节 分流〔下〕（1940—1945年）	(52)
中篇 创作特性论	(72)
引子：“冰山启示”	(72)
第一节 反日爱国文学的历史文化意义	(73)
第二节 怀乡文学的文化属性	(78)
第三节 东北的生命力的张扬	(83)
第四节 东北的历史文化的剖析和批判	(90)
第五节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99)
第六节 读者反应批评	(111)
下篇 抽样分析	(123)
——端木蕻良论	
第一节 不安的灵魂与史诗的追求	(123)
第二节 人为的力量与情绪投影	(146)

第三节 平面的扫描.....	(159)
第四节 比较的透视.....	(169)
附录.....	(181)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流亡文学”	(181)
茅盾与“东北流亡作家”	(193)
《呼兰河传》、《城南旧事》比较分析.....	(202)
参考文献	(213)